

当代湖州作家丛书

他们在历史长河中

传记文学

余方德 著



沈阳出版社

当代湖州作家丛书

他们在历史长河中

余方德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他们在历史长河中 / 余方德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7. 9

(当代湖州作家丛书)

ISBN 7-5441-3138-6

I. 他... II. 余...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7011 号

向太湖南岸的文学生活致敬

——《当代湖州作家丛书》总序

黄亚洲

2005年夏天热得早，季节味很浓。在这个成长的时节，湖州的作家们正忙着出版《当代湖州作家丛书》。听到这个消息，真为湖州的作家朋友高兴。也由此，湖州作协主席厉创平先生希望我说几句推荐之语，我想了想，也觉得有话可说。这座具有2300年历史的江南美丽的城市，毕竟是我的第二故乡，常在梦里萦怀。此次入选丛书的作家朋友，我都比较熟知，为朋友们的创作呐喊，既在情理之中，也属分内之事。

我在湖州先后生活了十年，这个城市是我文学生涯的起点，我的如河流一样的青春岁月，基本上流在了她的清雅的街市以及开满茶花和油菜花的原野上了。在那个年代，我陶醉于湖州那烟波浩淼的南太湖、千年古镇南浔、清凉世界莫干山、翠竹拥抱的安吉。我陶醉于这样真切的意境：“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鳊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但最让少年的我陶醉和遐想不已的是“文房四宝”之首——那带有传奇色彩的湖笔。因为有了毛笔，以及后来的湖笔，才有了曹不兴、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苏东坡、赵孟頫、吴昌硕等众多的书画大师和他们的传世之作；才有了沈约、吴均、丘迟、钱起、孟郊、张先、叶梦

得、徐中行、茅坤、臧懋循、凌濛初、董说、俞樾、朱孝臧、沈尹默、沈兼士、徐迟等一大批文学大家和大量的传世文学作品。湖州便是在这种清丽的笔墨中得以升华，在她那千年欸乃咿呀的橹声里漾开了文学艺术的浓浓韵味。

我甚至觉得，居湖州久了，你就是不想成为一个文化人也难，起码在气质上，你就已经与人不同了。你优雅自信，你从容大度，生活在你面前会被演绎成一册精装书。湖州就是这样描画着人的，描画每一个人，可以说湖州就是一枝笔，在她的描画面前你能感受到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当代的湖州作家和湖州诗人以极其自信的力量，向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向广大读者一次又一次地捧出自己的力作。应该向太湖南岸的文学生活致敬，这种生活是有传承的，充满魅力。

可以说，湖州的作家们一向是自信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植根的这块土地的文化底蕴，这种底蕴甚至以血脉的形态，很自然地在他们身上流淌。

湖州的作家们也一向是刻苦的。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湖州一茬又一茬的当代作家没有停过自己手中的笔。他们一直不倦地探索着，探讨着，探求着，从他们中间出现了许多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广泛影响的诗作、小说、报告文学和影视文学作品。

我与湖州作家们来往的时候，总是能感觉到他们身上涌动的血液以及他们对文学事业的那种虔诚，他们的孜孜不倦和他们的谦和好学，使我油然而生敬意并且从中学习到许多东西。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丛书也是如此。这些作品翔实地描绘了我们这个千姿百态的社会，记录了湖州令人难忘的岁月，同时也充分展示了作家们的内心世界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想，读者诸君是会非常欢迎和喜爱这套丛书的。

湖州的当代作家群和湖州的生机勃勃的当代文学事业是浙

江文坛的一大风景，我们盼着这道风景能在今后的岁月里更加亮丽和充满魅力。我们有理由坚信这一点，因为南太湖的这片土地是如此滋润和肥沃，而且几千年来都是如此。

2005年8月12日

周总理对我说(代序)

当长篇纪实小说《西北王胡宗南》《风流政客戴季陶》《死亡之约》和描写周恩来、陈毅、许世友、李宗仁、卫立煌、傅作义等国共两党高级将领系列中篇纪实文学陆续刊出、并将结集出版的时候,不少文艺界的朋友,奇怪地问我:“你怎么想到要把笔端触到国共两党高级将领这个领域?”

我一般只能答曰:当然与我童年的梦幻、生活积累有关。但现在我不能不说实话了,这还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教导有关。

我的家乡大别山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红四方面军鄂豫皖革命游击队、新四军、皮旅(皮定均任旅长)和后来的刘邓大军都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还在孩提时代,我除了知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袖人物外,还知道陈毅、徐向前、许世友、皮定均等将领,听到了他们的许多传说和故事。故乡人民尊敬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传诵和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故乡人民也不会忘记李宗仁、卫立煌、傅作义和胡宗南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仁的桂系军队,曾饮马长江边,驻扎在大别山区。在蒋家王朝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他主张与共产党和谈,并在人生的黄昏时

分，以极大的魄力和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归来，回到祖国和人民的怀抱。傅作义是一员战将，在杂牌军将领中颇得蒋介石的宠信，在解放战争到了最后关头，他是华北的“剿共”总司令。为了能把文明古都北平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他毅然宣布起义。至于卫立煌和胡宗南，就在我家乡解放的那个年代，乡亲们还骂他俩是“坏蛋”，因为他俩在一段时间里曾一起在大别山区剿过共，杀害过山区人民，立煌县便因此而来……但人民是宽容的，大别山区的人民是通情达理的，当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从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家乡人民感叹地说：“这个卫胡子，他也是浪子回头哩！浪子回头金不换，还是回大陆的好！”家乡人爱憎分明。对于胡宗南，大别山“剿匪”、侵犯延安，家乡人对他恨怨交加。1962年，报纸上登了一条很短的消息，说他在台北死了。老人们摇摇头说：“为什么跟老蒋到台湾去？走错了路还可以回头嘛！一生执迷不悟，到头来连尸骨都抛在对面那个小岛上，他不觉得可怜可悲？”

说起来也有意思，家乡解放那年，我才7岁，就开始梦幻：想等将来我有了文化，就写写这些人，写周恩来、陈毅、徐向前、许世友这些人，写他们的人生和故事，还要写李宗仁、卫立煌、傅作义、胡宗南甚至陈诚、汤恩伯这些人，写他们复杂的人生态势。60年代初我离开了故乡，从学校进了军营，到高级步校学了新闻专业以后，却被领导分到野战军去编写军史。这机会很好。我有机会接触到国共双方许多高级将领，一次次追踪，一次次约见，一次次交谈。那六七年我脑子里全是战火硝烟、腥风血雨……就在此期间，准确地说，是1965年7月16日晚上，我在上海东湖宾馆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采访了他，并聆听了他的许多教导——

陈毅同志是原来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我写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的军史，不能不去采访他。交谈了几次后，7月16日这天

晚上，他意外地打电话到我住的上海延安饭店，说是要带我去见一个人。当我听说这个人是萦怀我心间的周总理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总理？我可以去见见总理？”

东湖宾馆是一座花园别墅型宾馆。当陈老总领着我，穿过一条假山玲珑的亭榭回廊，走进一个环境清静的小型会客厅时，一个伟岸的身影正背对着我们在打电话——一看那背影，我的心就怦怦跳了起来：是他！是周总理在打电话。我在报纸上，在新闻纪录片中一次次地见到周总理。所以，现在一看到总理的背景，我就认出了他，并差点喊出声来。

“小鬼，总理在打电话，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陈老总拍了拍我的肩头，吩咐完后便向周总理走去。

与此同时，服务人员已给我端来了一杯绿茶——我因为激动，到走时也没喝上一口。

总理好像接的是长途，大约拿着话筒谈了十几分钟，他才把话筒放下。陈老总指着我和他说了几句什么，我看到总理转过脸来，把一双慈祥的目光投射到我身上。我慌忙站起身来，他却用手示意我坐下，又和陈老总亲切地交谈起来。

十几分钟以后，总理才走到我面前。说实在话，在电影中我老觉得总理很年轻、很精神、很帅，此刻他走到我面前，我才看到了他脸上已有老人斑了，胡楂发青，眉毛特浓。他习惯地把一只手放在胸前，一只手伸出来和我握了握，笑着说：“老总说你姓余，叫余什么？今年二十几啦？”

我有些紧张，便恭恭敬敬地说：“我叫余方德，东方的方，道德的德，今年23岁。”

“好嘛，名字很好记，东方的道德！”总理这样风趣地一说，我禁不住笑了，紧张的情绪似乎缓解了许多。

“坐下，坐下！”总理亲切地看着我坐下后，他才在我对面的

沙发上坐下来，又笑嘻嘻地对陈毅说：“老总，都说后生可畏，这话不假。23岁的小鬼，没参加过战争，却敢来写你们这些从枪林弹雨中爬出来的老元帅、老将军，不易哩！”

陈老总也笑了，说：“我们这些人有啥好写的嘛？我倒想问他，你敢不敢写李宗仁？”

“为什么不敢？”我也笑了，大胆地说，“李宗仁虽是桂系军阀、蒋介石的代总统，他最后还是主张和我们和谈的嘛！”

“应该说，李宗仁是爱国的。抗日战争，他指挥台儿庄战役，现在身在海外，他却时常挂念祖国。他在《欧洲周报》上发表讲话，公开说‘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呢’？”

“那卫立煌呢？卫老总你敢不敢写？”陈老总又问了。

“敢写。”我答，我早已不拘束了，说，“卫老总和我是安徽同乡，他回归祖国已经十年了，为什么不可以写？”

“对！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回来就是朋友。”周总理赞许地点头说。

“敢写不等于会写！”陈老总心直口快地说，“比如让你写傅作义或者胡宗南，你是歌颂呢，还是暴露？”

我迟疑了，想了想才说：“根据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像傅作义这样的朋友，是可以歌颂的；但像胡宗南那样的国民党将领，怕只好暴露喽！”

“我认为单纯歌颂不行，单纯暴露也不行！特别像傅作义、胡宗南这样生活道路不同而又十分复杂的人物。”陈老总说。

“对！”周总理浓眉一扬，坐直了身子对我说，“毛主席在那篇《讲话》中是谈到歌颂还是暴露问题，但还有个前提，前提就是主席强调的‘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实事求是，这很重要。就说傅作义吧，他驰骋疆场，追随蒋介石反共，我们将他列

为战犯。但他又割据华北，既不听蒋介石的，又不用美国的援助和反对美国干涉，颇有爱国精神。他拥兵自重，誓不为降将，但还是派人来和我们谈判，使北平和平解放，为人民立下了功劳。你把他这种极其复杂的个性写出来了，那才是傅作义的形象。再说胡宗南，我和他打过交道，他一生反共或者主要方面是反共的，但听说他进黄埔前当小学教员，蛮有点正义感。进黄埔后，他和蒋介石搭上了‘老乡’，跟着蒋介石跑，这当然不好，但在上海，在黄河流域，他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兵败大西南，也对抗过蒋介石……要写好他们，还是鲁迅先生总结《红楼梦》的经验：‘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红楼梦》中的那些人物，才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

——“看来，这个领域人物不那么好把握，也真的比较难写。人有左右手，将有敌我友，兴许写我们方面、写朋友方面好一些……”

“不不！”总理笑了，“陈老总就好写吗？也难写。关键是要把你写的那些高级将领都当作‘人’来写，当作具体的‘人’来写。不能写我们方面的将军、老帅都成了偶像、好人，而国民党方面的将领都是坏蛋、恶魔。结果你写出来的只是某种典型，或者叫类型，某种概念，不是天上的爱神就是地狱的魔鬼，而不可能是活的人物，活的生命，不可能写出好作品来。”

“精辟！”陈老总笑了，说，“总理很懂文艺嘛！”

“要说懂，你陈老总比我还懂。你的诗词就写得很好嘛！我也只能说点概念。比如说吧，人的性格是历史进程中‘人’在其社会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的。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也不能不受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所以要写好国共双方的将领，还要深刻揭示这些将领与环境、与历史的真实关系。要不然，为什么同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有的成了我们的将军和元帅，有的却跑到台湾

海峡那边去了。这一点写好了，作品就有厚度！一个将领，可以写出一个朝代的兴衰。”

总理的谈话和分析是十分深刻的，我都听呆了。

“当然，要真正写好这些人，写好他们的心态、性格，他们与历史和环境的深刻关系，你就要深入生活，了解他们，研究他们，熟悉他们……”

那一夜，总理谈兴很浓。他谈到卫立煌从香港归来，傅作义在北平的和平行动，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和胡宗南兵败大西南后，他派胡公冕先生去策反的种种情况……

后来，我们的话题又扯到总理本人身上。周总理一般不谈自己，但那天晚上他似乎特别高兴，也谈了他一生中几次大的险情。中间，常有电话来找总理，总理去接电话时，就让陈老总谈他留在红色苏区坚持赣南革命斗争以及新四军抗战的许多事。总理回来了，又接着谈总理的一些活动。但总理一再嘱咐：谈给你听可以，但不能写。“你可以去写李宗仁，写卫老总，写傅作义，写胡宗南，但不要写我！”

那一夜我们谈了多少时间？一个小时？二个小时？抑或三个小时？我去时，忘了看表，走时也想不到看表。我只记得，总理亲自把我送出客厅，握着我的手叮嘱我：“有机会，你可拉着陈老总再来找我，什么人什么事都可以谈！”

当我和陈老总分手时，人还处在一种如醉如痴的亢奋状态中。我不想坐车，一个人沿着东湖路、富民路慢慢地向延安西路踱过去！寂静的马路边的法国梧桐以及偶尔擦肩而过的行人，都是那么亲切，那么可爱，头顶上黛蓝色的天宇仿佛升高了，那一颗颗宝石般的星星好像变大了，变得更亮了！我不知道天已近黎明，有一群灰白色的鸽子在我头顶上呼啸而过，发出一阵动人的咕咕声……

7月20日新华社广播了一则消息：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归来……当我调查到李宗仁先生是16日晚上从卡拉奇起飞，17日凌晨由云南进入祖国时，我才恍然大悟：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在东湖宾馆那天晚上为什么会有点空闲？为什么他那么高兴，谈兴那么浓？又为什么老是和我谈到李宗仁、卫立煌、傅作义、胡宗南……

可惜，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前去采访陈毅同志，更没有机会去拜访周恩来总理了。因为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来了！陈老总处境困难，周总理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忙！虽然后来我在杭州饭店又一次见到了周总理，总理陪同一位外国元首，我们已不可能再谈什么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走了满天乌云。想起了周总理在东湖宾馆对我的教导，我写出了陈毅在赣南坚持敌后斗争和许世友将军的一段传奇，写出了李宗仁和卫立煌先生回归祖国时的种种经历，写出了傅作义在“北平行动”中与蒋介石及其心腹、与中统和军统拼死搏斗的内幕……

感谢《文学报》，在长篇纪实小说《西北王胡宗南》《风流政客戴季陶》和《死亡之约》出版时，都专门给我发了消息。《北平行动》出版后，《文学报》还以《北平和平解放的大门谁打开》为题，选登了作品的中心章节。

余方德

2006年9月28日

注：此文原载《文学报》1992年8月5日副刊。选作代序时，第一段和最后一段略有修改。

目 录

向太湖南岸的文学生活致敬

——《当代湖州作家丛书》总序 黄亚洲 1

周总理对我们说(代序) 4

周恩来劳山遇险的真实内幕 1

傅作义在“北平行动”中 13

“小平楼”的故事 77

李宗仁两次险遭暗杀内幕 88

陈毅历险记 104

卫立煌的往事(两篇) 134

宋哲元勇赴“鸿门宴” 167

陈果夫、陈立夫与国共第二次合作内幕 174

周恩来劳山遇险的真实内幕



劳山遇险时期的周恩来（右）与徐向前（左）合影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生中多次遇险，而每一次遇险都与中国革命血肉相连，而最危险的一次，就是在劳山遭到匪徒的伏击。

对周总理劳山遇险，一些报刊杂志都曾有过记载，但我看后，觉得内容有许多失实：或捕风捉影，或以讹传讹，或胡编乱造，甚至把这次事件说成是“国民党军统保密局”的一场阴谋，越说越玄。

笔者有幸采访

过周总理本人和劳山事件中几位当事人。现把周恩来在劳山遇险的真实内幕披露如下。

周恩来因故推迟了出发时间

周恩来劳山遇险，发生在 1937 年 4 月 25 日。

这天早饭后，一辆敞篷军用卡车从延安南门外红军总供给部大院开出，驶上了依山而筑的黄土公路，带着股股黄色烟尘向西安方向开去。

在卡车的驾驶室里，坐着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车厢里坐的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周副主席的随从副官、延安卫戍参谋长陈友才，原陕北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当时调任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秘书孔石泉，保卫局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以及担任这次护送任务的特务队一个班战士。再加上警卫员、译电员等，一共二十余人。

周副主席这次离延安南下，是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西安同国民党的代表顾祝同、张冲就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建立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作进一步会谈的，后来又赶到庐山直接同蒋介石会谈。

本来，周恩来这次去西安是决定 4 月 24 日起程的，边区保卫处做了周密的部署和准备。他们派了特务队一个排，由排长和副排长亲自带队护送，且令三辆军用卡车同行。这样，万一有情况可以相互策应，而且即使遭受什么不测，敌人也不知道周恩来坐在哪辆车上。保密工作做得十分机密，连特务排的同志们出发前还不知道去执行什么任务。对汽车也是早几天就做了检查，并加哨看守。不想，正因为对军用卡车加哨看守，恰恰引起暗藏在延安的狡猾的匪徒“坐探”的注意。

事情临时又有了些变化：24日早晨，当卡车已发动起来，担任护送的警卫排战士分别在指定的卡车上坐好后，周恩来、张云逸同志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商讨会谈大事尚未出来。会谈的内容太重要了，关系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红军的生存和江南游击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存在，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等。当陈友才赶来催促时，许多问题尚没商定妥当。周恩来和毛泽东交换意见后，决定让特务队一排排长率领两个班护送两辆卡车准时出发，留一辆卡车给周副主席，由副排长陈国桥率领一个班跟随周副主席25日再起程。

按实际情况和延安附近的形势来说，这样决定也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周副主席正确地调解了“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已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沿途驻扎的部队都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他们和红军的关系已到了非常友好的阶段；至于零星的土匪、民团之类，当时正在清剿阶段，他们躲都来不及，哪里还敢来袭击红军，袭击周副主席的卡车？

事情就出在这“临时改变”上。土匪皆是些贼胆包天、罪大恶极的亡命之徒，于是趁虚而入。

劳山，潜伏着危险

卡车一过了三十里铺，便很快进入劳山地带。劳山公路坑坑洼洼，坡坡坎坎。卡车在路上颠簸，车轮扬起的尘土简直像黄雾一般地弥漫开来。

劳山，本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蜿蜒曲折地横贯在延安和甘泉两县之间，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分水岭。劳山公路两旁，沟壑纵横，地形险要，遍山皆是茂密的树林和近人高的荒草。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